

日本论

日本人

历经七十余年光阴印证
中国人认识日本第一书

戴季陶 蒋百里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014012907

C955.313

37-2

圖書編目(GB)数据



95333
37-2

〔宋孝子傳 青霞公跋〕

廣東旅遊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中国·广州



20130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论 / 戴季陶著. 日本人 / 蒋百里著. -- 广州
: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80766-731-5

I . ①日… ②日… II . ①戴… ②蒋… III . ①民族性
—研究—日本 IV . ①C955.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7628 号

责任编辑：梅哲坤

封面设计：天之赋

责任技编：刘振华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76 号中侨大厦 22 楼 D、E 单元 邮编：510075)

邮购电话：020-87348243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ourpress.cn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昌平区上苑秦屯村)

710×1000 毫米 16 开 12.5 印张 150 千字

2014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日本论

戴季陶与《日本论》 / 003

胡汉民序 / 007

一、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 / 017

二、神权的迷信与日本国体 / 020

三、皇权神授思想及其时代化 / 024

四、封建制度与佛教思想 / 029

五、封建制度与社会阶级 / 033

六、日本人与日本文明 / 036

七、武士生活与武士道 / 040

八、“町人”和“百姓”的品性 / 044

九、“尊王攘夷”与“开国进取” / 048

目次

- 十、“军阀”与“财阀”的渊源 / 055
- 十一、维新事业成功之主力何在？ / 058
- 十二、现代统治阶级形成的观点 / 062
- 十三、政党的产生 / 066
- 十四、板垣退助 / 072
- 十五、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 / 075
- 十六、军国主义的实质 / 080
- 十七、中日关系与日本南进北进政策 / 086
- 十八、桂太郎 / 091
- 十九、秋山真之 / 097
- 二十、昨天的田中中将 / 105
- 二十一、今天的田中大将 / 116
- 二十二、信仰的真实性 / 128
- 二十三、好美的国民 / 137
- 二十四、尚武、平和与良性生活 / 145

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

蒋百里与《日本人》 / 155

绪 言 / 157

一、几个自然条件 / 158

二、几段历史事迹 / 162

三、明治大帝 / 165

四、欧战 / 168

五、固有的裂痕 / 171

六、军人思想之变迁 / 174

七、政治 / 179

八、财政经济 / 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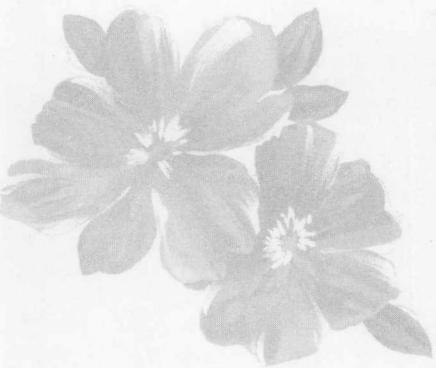
九、外交 / 185

十、精神上的弱点 / 188

十一、黄金时代过去了 / 190

十二、结论物与人 / 192

这本书的故事 / 194



日本论

◎戴季陶◎

戴季陶与《日本论》

戴季陶（1891~1949年），原名良弼，字选堂，号天仇，后改名传贤、字季陶。籍贯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中国政治家、中国国民党元老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1905年，戴季陶去日本留学，进法政大学，四年后回国。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民权报》，后任孙中山秘书，并受命进行二次革命的军事联络活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1916年，戴季陶随孙中山回国。次年由上海去广东任大元帅府秘书长。五四运动时期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并且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的伦理问题，并参加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4年1月，戴季陶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1924年11月，他随孙中山北上。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他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歪曲和篡改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形成

了所谓戴季陶主义，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等人篡夺革命领导权提供理论根据。1926年，他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后来任司中华民国考试院长达二十年。

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并曾长期旅日，曾协助绝对劣势的日本自民党党魁参加首相竞选，几乎成功；他潜心深入研究日本，被日本学者称为中国近代“知日三白眉”之一。“九一八”事变后，戴季陶曾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委员会主任，斡旋于国联各国之间希图解决中日问题。

戴季陶写《日本论》与自身在日本的经历和整个时代背景有直接关系。戴季陶为孙中山做了十几年的秘书，孙中山访问日本的会见和演说都是由他担任翻译，孙中山与桂太郎等人的密谈，戴季陶也亲自参与，这些都为他研究日本打下基础。戴季陶在日本朝野上下都有朋友，随同孙中山访日期间，他对这些人进行劝导，希望能转变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发生后，孙中山派戴季陶到日本，调查日本政界对此事的态度，他到了日本之后接触到了一些日本陆军和海军将领，并在后来的《日本论》中进行了论述。

当时整个的时代背景是，国内国共合作因为国民党的反共暴行宣告破裂。1926年，国民党军开始北伐，并且把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北伐在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国民党内部出现问题，蒋介石和汪精卫就革命方针产生了严重的对立。随后，国民党派遣戴季陶去日本，这次他会见了日本政坛元老西园寺公望，表明中国革命的目的。随后，蒋介石率兵从津浦路方向北伐，逼军阀张宗昌、孙

传芳败退至山东、江苏省。日本在山东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有经济利益，为保护自己的特殊利益，日本以保护日侨的名义出兵山东。北京政府照会日本驻华使馆，认为“在鲁外侨从未受丝毫影响，殊无派兵保护之必要。此次贵国政府不先征求中国政府同意，突然派兵来青岛，且欲相机赴济南，不能不认为违背条约，侵犯主权之行动”。要求日本迅速中止派兵赴青岛，但是日本却对此置之不理。

中国逐渐落后于日本，日本不断觊觎中国的国土和资源。中日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的屈辱，刺激了戴季陶研究日本振兴中华的愿望。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不断强盛，以及类似出兵山东事件的不断发生，更加促使了戴季陶研究日本，以此来解决国家的一些问题和引起国人密切关注日本的态度。于是戴季陶从历史、政治、哲学、风俗等多方面研究日本，用自己的思考和评判剖析日本、探寻日本文化的本质，并且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进行深刻的分析。

1928年，《日本论》一书出版，全书文笔流畅、语言平实，对日本的理解深厚精粹，没有学术研究的生涩、艰深，它被视为研究日本的一本重要著作。即使在今天，《日本论》也是介绍日本的书中写得最好最深刻的一本，是中国人认识日本的第一书。即使今天读《日本论》，对于我们认识日本的国情、民族性格及其风俗习惯仍有一定的帮助，对我们了解近代中日关系会有很大的启示。

胡汉民序

胡汉民（1879～1936年），原名衍鸿，字展堂，广东番禺人。

国民党元老之一。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12年1月民国成立后，任总统府秘书长，后来曾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

英国的历史家韦尔斯于今年春间，发表一篇文字，同情于中国革命，而警告欧洲人，内里说及欧人之了解中国，决不如中国人之了解欧洲，大意欧洲人只是一些教士商人以及替教士商人说话的几个新闻通讯员，他们耳目既然狭隘，而带了着色的眼镜观察，更其靠不住，至于中国人呢？却是一年一年许多留学生到欧洲，受学校的教育，和社会接近，经过长期的体察，自然不是前者之比。这一种比较的批评，认为公允，几乎令欧洲人不容易反唇相讥，中国人也觉得非常悦耳。不过我们一搜查中国留学生关于批评欧洲有系统的研究较为成器的著作，好像还未出世，中国人对于韦尔斯的公道评论，就怕要暗暗叫声惭愧。

不要说欧洲，就是日本，我们又如何呢？地理是接近的，文

字是一半相同的，风俗习惯是相去不远的，留日学生较之留欧学生，数量要多十几倍，而对于日本，也一样的没有什么人能做有价值的批评的书。从好的方面说，小心谨慎，不轻于下笔，也是有的。从不好的方面说，就无异表示我们学界科学性和批判力的缺乏。季陶先生说，我十几年来总抱着一个希望，想要把日本这一个题目从历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学、文学、宗教、政治、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的动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的装置起来。现在《日本论》一书，就是季陶十几年来做他所志愿的工作写出来的结晶。我前十年听见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两个日本同志说，戴先生作长篇演说的时候，他的日本话，要比我们还说得好。我拿这句话来赞《日本论》，我敢说，季陶批评日本人要比日本人自己批评还要好，是否武断，且让读者下最后的批判。而我所以敢说这句话，就因为他不止能说明日本的一切现象，而且能剖析到日本所以构成一切的动力因素，譬如一个武士道，在日本是最普遍的伦理，好像英国的“gentleman”，日本人自己也弄到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季陶先生说：

武士道这一种主张，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武士道内容的书，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

治时代，更由旧道德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的扩大和变迁，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明治维新，都知道是起初打着尊王攘夷的招牌，而幕府一倒，后来政治的建设成绩，却大过当初的预想。这是天皇圣明吗？是元勋元老的努力吗？是统一的效果吗？直到明治四十一年，日本文明协会丛书出版的《欧美人之日本观》，还是说，我们动辄把日本维新的成效归功于日本人一般的天才，事实却是相反，日本之一大飞跃，只是指导者策划得宜，地球上任何邦国，没有像日本指导员和民众两者间智力教育、思想、伎俩悬隔之大的，而能使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无何等嫉视，不缺乏同情，就是指导者策划设施一切得宜，他们遂能成就此之当世任何大政治家毫无逊色的大事业，（略见原书中篇第一节）这样浅薄皮相的话，我从前看见，就觉得肉麻得没趣。而季陶先生说：

那时代欧美的民权思想，已经渐渐输入进来，汉学思想和欧美思想相融和，就有许多人觉得这一种非人道的封建制度，非打破不可，这实在是由种种环境发生出来的“自觉运动”。……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这民权运动是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而欧洲思想做了他们的模范，和萨长两藩专靠强力来占据政治地位不同。且看民权运动最有力的领袖板垣退助，他的思想完全是受法国卢梭《民约论》的感化，近来日本的文化制度，虽然大半由德国学来，却是唤起日本人的同胞观念，使日本人

能从封建时代的阶级统治观念里觉醒起来，打破阶级专横的宗法制
度，法国民权思想的功绩真是不少。而我们更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
材料来证明“辩证唯物论者”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合革命史上
全部事实（反对阶级斗争学说，是戴季陶主义的主要构成）。譬如
日本维新的结果，解放了农民阶级，使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和政治
上法律上的地位，这个运动并不是起自农民自动，而仍旧是武士阶
级当中许多仁人志士鼓吹起来的。

季陶先生在日本维新一个大过程中，并不是抹杀一切指导者的
劳绩，不过他有很深的理解，和上述《欧美人之日本观》的一段肤
浅可笑的议论不同。他说：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绝不是靠一两个人的
力量创得起来。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
要素。创造时代的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
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的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
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
众，同时作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
作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彼人的信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

所以普通人看日本维新史，都晓得萨摩长门并起，而长藩的人
物，一直延续到今日，尚成为日本的军阀，萨藩的领袖西乡隆盛，
却是失败的英雄，只有追悼他维新以前的勋业。而季陶先生说：

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
问题……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
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失败者的福。我们试把这几十年历史通看

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个人来推进。当时随着他败了的土肥两藩的势力，一化而为后来民权运动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余荫还是支配着日本全部的既成政党。那事功上成功的长藩，一方面不能不拜倒在西乡的个人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随着公论的推移，定他的政策。即以事业说，西乡的征韩论，直到死后十八年依然成为事实，到死后三十年，公然达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乡的征韩论通过了，也许是闯了一场大祸，日本的维新事业，完全付之东流，而西乡的个人也都埋没干净。

这一段话，抵得过别人一百篇西乡的传赞。我们只看西乡当王政统一的时代，举兵造反，犯了弥天的叛逆罪名以死，而死后不到几年，他的铜像巍峨矗立于上野公园，受全国人民的崇拜，并且全日本没有一个铜像可以和他并称的。至于伊藤博文事业上的成功，从表面看来，中外人都觉得他远过于西乡，死在高丽人之手，也是歿于王事，而他的铜像，在东京被人打倒，甚至搬到大阪，也不能成立。这些事说明了什么？就是说明毕竟成功的是失败了的西乡，而不是伊藤一辈人，长藩的领袖虽然享着福荫，毕竟是有限的。季陶先生这一段话，我想任何日本人都不能反对，不过见不到，说不出这样彻底罢了。

我常以为批评一国家的政治得失易，了解一民族特性难。政治有许多明显的迹象，就是它因果联络关系，也容易探求而得其比较。至于一个民族的本真，纵的是历史，横的是社会，如季陶先生所说的，既要有充分研究古籍的力量，还要切实钻到它社会里面